

# 论范蠡对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理论贡献

徐文武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春秋晚期思想家范蠡对战国时期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范蠡“人事与天地相参”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黄老道家“以因循为用”的实践原则,也是由范蠡“贵因”方法论发展而来的,范蠡的“天道循环”思想以及阴阳转化学说,更成为构成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范蠡;黄老道家;影响

**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1-0026-05

在黄老学发展史上,范蠡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关于范蠡在黄老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陈鼓应就曾指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sup>[1](P5)</sup>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范蠡之学已属于黄老之学,或是黄老之学的雏型。李学勤说:“《越语下》所述范蠡的思想,显然是应该划归黄老一派了。”<sup>[2]</sup>王博说:“范蠡的思想可以说正是所谓黄老之学的雏型。”<sup>[3](P360)</sup>上述诸家之说,都将范蠡与黄老道家关联起来,对探讨范蠡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影响,及研究黄老道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各家对范蠡在黄老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缺少深入的探究,又使得相关研究浮于表象。本文兹就范蠡之学对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理论贡献,略陈己见。

将天、地、人三者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道家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有价值的闪光点,是将人类作为宏观宇宙构成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而不是将人类看作宇宙万物的对立面,或者是独立于万物之外的存在,从而为人类在宇宙万物中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定位。

天、地、人一体观在《老子》一书中已有论述。《老子》第25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所说的“四大”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天、地、人的创生者,因而道是独立于天、地、人之外而存在的,除道以外,宇宙中的重要构成就只有天、地、人三部分了。《老子》特别地指出“人居其一焉”,意在强调人是宇宙万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老子》将天、地、人与道并称为“四大”,强调了天、地、人在宇宙构成中的地位,已初具整体思维特征;但其对于如何看待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范蠡对《老子》的“四大”说进行了改造,将作为宇宙本原和本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道从“四大”中移出,使《老子》的“四大”变成了天、地、人三大,从而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想。在《国语·越语下》所记载的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对话中,范蠡总是将天、地、人三者视为既有差异又有联系的整体,即其天、地、人三位一体思想的体现。范蠡的天、地、人三位一体思想建立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天、地、人在宇宙存在中的整体性意义。范蠡是一个富有实践精神的哲学家。他并不满足于理论的探寻,更关注理论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力量和价值。在建构天、地、人三位一体理论的同时,范蠡提出了“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实践原则。范蠡认为,人与天、地一样,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天地四时的运行是有规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X040)

作者简介:徐文武(1964-),男,湖北洪湖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律的,人只要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就可以找到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从而达到有序发展的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范蠡提出了“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原则:“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sup>[4]</sup>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实践原则,最后才取得了成功。

范蠡所提出的“人事与天地相参”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第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范蠡认为,天、地、人虽属于同一个整体,但三者各自有着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人在效法天、地的时候,要按照不同的事物特性来决定效法的对象。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他认为,君王治理国家,要分清三类国事,即“持盈”“定倾”和“节事”。所谓“持盈”,即保持国家昌盛;所谓“定倾”,即扶正危亡;所谓“节事”,是指节用惠民。针对这三类国事,范蠡提出了“三与”的原则:“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意即“持盈”要效法天,“定倾”要效法人,而“节事”则效法地。这是因为天之常道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君王如果效法天道,就会保持谦虚谨慎,不会骄奢淫逸,自矜其功。地之常道是能曲成万物,包容美恶。君王如果效法地道,就会施惠百姓,使百姓衣食富足。而挽救国家危亡,还要研究敌方的人性,尽量去满足对手在心理、物质和欲望方面的人性需求。这可以使对手放松警惕,为己方赢得反击的时间。

正是在范蠡“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实践指导原则的影响下,后来黄老道家才进一步形成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我们在黄老道家的“标本”《黄帝帛书》中,可以看到范蠡的影响。《黄帝帛书·经法·六分》云:“天下大(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以天地,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这里所说的“参之以天地”,与范蠡所说的“与天地相参”是一致的。《六分》篇下文又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这里将天地人相参的思想表述得更为通俗易懂。由此可见,范蠡的“人事与天地相参”思想,对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 二

所谓天道,在道家那里指的是自然天体和自然现象的规律。黄老道家主张人法天地,将天道作为人事的依据与范本,因而对天道的探索尤为重视。在《老子》中,“天道”一词凡两见,其一见于第47章:

“不窥牖,见天道。”其一见于第79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另有5处用的是“天之道”,如第九章:“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再如第81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虽然屡言“天道”与“天之道”,但都只是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概括天道对人的借鉴意义,对天道本身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在老子之后,范蠡是第一个对天道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的学者。范蠡在对自然天体以及自然现象的总结中,对天道有了系统的认识,发展出了天道循环、天道阴阳、阴阳转化以及阴阳刑德等思想。

《老子》强调道是“周行不殆”的,说明道的运行是循环往复的。由于道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道是如何“周行不殆”,循环反复运行的,是很难进一步进行解说的。范蠡似乎认识到了道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让一般的人很难把握和理解。他极少讲作为本原与本体存在的道,而以天道取而代之。因为相比较而言,人们对天有更直观的认识,透过天来讲道,更容易让人接受和信服。范蠡对天的规律性的总结,是从对天体运行的规律性的探索开始的。在自然天体的运行中,由于日、月周而复始的运行,使得人类生存的地球有了昼夜、四时的规律性变化,这是每一个人都能真实地感受到的。日、月周而复始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通过对日月运行的观察,就可以得出天道循环的结论。《玉海》卷一引《范子·计然》云:“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纪度而成数,寸者,计万物阴阳之短长。日行天,日一度,终而复始,如环无端。”范蠡以尺寸为喻,说明日月的运行是按照一定的度数进行的,正是有了这种度数的规定性,才使得日月的运行呈现出循环反复的规律性。在范蠡看来,日月运行的规律性就是天道的生动表现,所以他说:“终而复始,如环之无端,此天之常道也。”<sup>[5]</sup>

在范蠡之后,黄老道家不仅继承了老子“周行不殆”的天道思想,而且对范蠡的“天道循环”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使其得到充实和完善,最终使“天道循环”的思想“贯穿在整个《黄帝四经》中”,成为“黄帝之言哲学的核心和基本点”。<sup>[6] (P179)</sup>《黄帝帛书·姓争》中有“天道环周”“天稽环周”等表述。这里所说的“环周”,显然是从范蠡以“环之无端”比喻天道“终而复始”而来的。不仅如此,《黄帝帛书》对于“天道环周”,也是从日月运行的规律性来进行论证的。如《四度》云:“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立,外内之处,天之稽也。”又如《论约》云:“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以上都是从日月星辰具有度数的规定性来谈循环往复的天道规律

性,与范蠡的思路如出一辙。《黄帝帛书》《鹖冠子》等黄老道家经典著作,反复通过日月运行所具有的“度”“数”的规定性来解释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的规律性,为“天道周环”“物极必反”的理论找到了天道的依据。《黄帝帛书·经法·论》和《鹖冠子·泰鸿》都有一段相同的文字:“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太阳的南北运行,因为具有南极和北极的“度”的规定性;月亮的阴晴圆缺,因为具有“数”的规定性,都表现出了周而复始的规律性。黄老道家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月运行规律来解释天道周环的规律性,使得“天道周环”的理论更易被人们所接受。

### 三

中国古代的阴阳范畴,最初是指日照的向背,即所谓的“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到了西周末年,人们才将阴阳与气结合在一起,发展出阴气和阳气二气说。如西周末年的周朝太史伯阳父在解释地震的成因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他认为,由于天地之中的阴阳二气出现不和失序,才导致了地震的发生。一直到春秋末期,老子将阴阳范畴引入道家思想体系,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时,仍然是把阴阳作为自然界存在着的两种异质的气体来看待的。

在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发展史上,范蠡有三个重要的贡献:其一是明确将阴阳纳入道家的宇宙生成体系中,提升了阴阳范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其二是将阴阳的内涵进一步扩大,用阴阳来指代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阴阳转化的哲学思想;其三是将阴阳学说与政治结合起来,提出了阴阳刑德的命题。

范蠡在讨论宇宙生成问题时,将阴阳二气纳入到宇宙生成的序列中。他说:“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天地立,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而万物备。”<sup>[5]</sup>在范蠡描述的宇宙生成过程中,道生气,气分阴阳,阴阳创生天地、万物。在这一过程中,阴阳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阴阳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奠定了阴阳范畴在中国古典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范蠡还将阴阳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使其由阴阳二气上升为宇宙万物中普遍存在的一切对立面的抽象性概念。范蠡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范畴,如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强弱、勇怯、死生、予夺、取与、赢缩、徐迫、左右、蚤晏(早晚)、饥饱、大小、彼我、远近、

先后等等,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揭示对立统一的普遍性,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阴阳范畴来涵盖。范蠡在与越王勾践谈论治国之道时说:“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这里就是以阴与阳这一对范畴来概括柔与刚、德与虐等。将阴阳从具象的概念上升为抽象的哲学范畴,正是由范蠡完成的。

范蠡继承了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提出“阴阳进退者,固天道自然”<sup>[5]</sup>,强调阴阳对立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范蠡最早明确提出了阴阳转化的命题,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范蠡所说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sup>[4]</sup>。范蠡有时也用“赢缩”这一对范畴来表述阴阳关系,并明确提出了“赢缩转化”<sup>[4]</sup>的命题。在范蠡的思想体系中,“赢缩”这一天文学、星占学术语,有时有其固有含义,如“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赢缩转化……天节固然”等。这里所说的“赢缩”与四时和星象有关,是指四时长短、星辰进退变化。范蠡将“赢缩”一词从天文、星占术语中提炼出来,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以抽象概括矛盾的对立面。《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范蠡在这里所说的“赢缩转化”,已不是星占学上所说的星辰进退变化。他已经将“赢缩”从一个星占学的术语抽象出来,用以指一切事物的对立面,从而使“赢缩”一词摆脱了星占学的束缚,具有了哲学的意蕴。

范蠡对于阴阳学说的贡献,除了他提出的“阴阳转化”说外,还有“阴阳刑德”说。刑德本来是指中国古代治理社会的两种手段,即刑罚制裁和道德教化。范蠡是第一个将阴阳学说与政治结合起来,提出“阴阳刑德”说的人。他认为,刑德在宇宙万物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天道阴阳规律的表现。这为刑德治国找到了终极理论依据。《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范蠡之言说:“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范蠡认为,自然天象中的日月星辰和人类政治中的刑德都是阴阳之属。范蠡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阴阳刑德之说,可以说他开启了古代法律自然化的先河。

范蠡的阴阳学说,后来对黄老道家形成宇宙生成论与对立统一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黄帝帛书》的宇宙生成论中,阴阳是仅次于道的天地万物的创生者。《黄帝帛书·十大经·观》中描述的宇宙



生成过程是这样的:道创生宇宙之初是“无晦无明,未有阴阳”的,随后道创生了阴阳;而在阴阳创生之后,才有了天地万物,“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刚柔相成,万物乃生,德虐之行,因以为常”。这里所描述的宇宙生成的逻辑顺序是非常清楚的,即先有道,再有阴阳,然后有四时、天地、万物。由此可见,《黄帝帛书》继承了范蠡的宇宙生成学说,将阴阳范畴放在宇宙生成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对于范蠡的阴阳对立与转化理论,《黄帝帛书》更是全盘加以吸收。《十大经·称》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恶”,以左右、牝牡、山泽、黑白、美恶等相反相成的关系来阐释阴阳关系存在的普遍性。《黄帝帛书》在这些具体的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提升,如《十大经·姓争》说:“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这里对阴阳两面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述。《黄帝帛书》中还出现了“赢”与“宿(缩)”这一对范畴,并与阴阳交互使用,如《经法·观》就有“赢阴布德”“宿阳修形”等用语,显然也是受到范蠡“赢缩转化”思想的影响。《黄帝帛书》对阴阳转化也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总结,如《经法·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之道也。”又如《经法·论》说:“极而反,天之性也。”以精练的语言总结了宇宙万物“物极必反”的规律。

范蠡的阴阳刑德学说,后来被黄老道家广为接受。黄老学代表作《黄帝帛书》继承了范蠡的思想,提出“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将刑德与阴阳两两对应起来,形成了所谓的“阴阳刑德”观。范蠡也以“德虐”一词代替刑德,如《国语·越语下》记范蠡之言曰:“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认为赏和罚的施行是以天地为常法的,生和杀的掌握是以天地为准则的。《黄帝帛书》中继承了范蠡“德虐之行”的说法。《十六经·观》说:“德虐之刑,静作之时,以为天下正。”范蠡所说的“德虐之行”,在《观》中写作“德虐之刑”,“刑”字当为“行”字,因同音而讹。《管子·四时》融入了齐国稷下黄老学的思想,该篇将阴阳、日月、德刑合为一体,提出“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之说,同样源于范蠡。

####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这里所说的“道家”,准确地说,应该是指黄老道家。黄老道家思想以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为特征,

而“以因循为用”正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实践原则。

《老子》中没有出现“因”或“因循”的概念。最早将“因”作为方法论概念提出出来的是范蠡。范蠡提出了“因天地”“因阴阳”等命题,强调人事要顺应天道、阴阳的规律。《国语越语下》记范蠡之言曰:“因天地之长,与之俱行”,“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在范蠡的这些言论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因”字,强调尊重和依照自然规律办事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他的“贵因”的思想主张。

值得肯定的是,范蠡提出“因天地”“因阴阳”,并非一味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完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主张因顺自然,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有利时机,从而获得成功。范蠡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又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sup>[4]</sup>在这里,范蠡主要是强调圣人贵在“守时”,即要顺应“天时”,时机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但在“守时”的同时,他又强调“因时”:“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即等待时机的到来,根据时局的变化寻求制胜的策略。

黄老道家充分吸收范蠡提出的“因天”“因时”的“贵因”方法论,并站在“民本”的高度提出了“因民”的政治主张,从而使“贵因”的方法论从重视天道向天道与人道并重发生转变,体现了黄老道家可贵的创新精神。首先,黄老道家秉承范蠡“因天地”“因阴阳”的思想,强调圣人治国要“因天之则”<sup>[5]</sup>,即因顺客观自然的规律行事。黄老道家认为,“因天”是圣人治世的基本方法,“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之”<sup>[6]</sup>,“因天之则,失其天者死”<sup>[7]</sup>,强调因顺自然规律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其次,黄老道家继承范蠡的“因时”思想,提出了行为做事要依循“因时秉宜”的原则。在《文子·九守》中,就谈到了“因时”的问题:“所谓圣人者,因时而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这里说的是统治者要因顺时势的变化安定他的统治地位。这是从政治上强调“因时”的重要性。《黄帝帛书·十大经·兵容》中,还谈到了军事上“因时”的重要性:“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sup>[8]</sup>黄老道家认为,将“因时”这一方法论运用在军事上,就是要把握有利时机占得先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范蠡所倡导的“因天”“因时”,强调因顺自然规律,把握事物发展时机,是其天道论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黄老道家在继承范蠡“贵因”方法论的时候,将“因”的方法论从天道扩展到人道,提出了“因民”

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因顺民心、民力、民欲治理国家,体现了黄老道家可贵的民本思想特色。在黄老道家经典著作《黄帝帛书》《文子》《鹖冠子》等书中,都提到了“因民”。《黄帝帛书·称》篇提出“因地以为资,因民以为师”,要求执政者因顺百姓,以百姓为良师,其重民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黄老道家的“因民”主张,强调因顺百姓的人性、风俗治理国家,使其民本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子·自然》两次提到了“因民之欲”。先是以“渎水”与“生稼”为例谈“因民之欲”：“古之渎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该篇还说：“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所谓“因民之欲”，就是要求执政者顺应百姓的喜憎行事。《文子·上义》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要求执政者依顺民众愿望,以“民之所喜”“民之所憎”作为是非标准,依赖民众力量“劝善”“禁奸”，为他们消除祸患。“因民之欲”的政治主张,肯定了普通民众人性的合理性,并将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这是黄老道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可贵闪光点。《鹖冠子·天则》认为,执政者对百姓的教化也要“因民”而教：“田不因地形,不能成谷；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以种田要因地制宜才有所收

获,比喻教化百姓也要因顺民心才能形成良好的民风民俗。总之,黄老道家所提倡的“因民以为师”“因民之欲”“因民之所喜”等政治主张,要求执政者充分重视民众的意愿、喜好以及民众的意见,对提高百姓在政治中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黄老道家提倡“因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因民”达到“治民”“牧民”的目的。

综上所述,范蠡的思想对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思维方式、天道观、阴阳学说以及方法论等方面,黄老道家受到了来自范蠡的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说,范蠡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 参考文献:

- [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2]李学勤.范蠡思想与帛书《黄帝书》[J].浙江学刊,1990(1).
- [3]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 [4]左丘明.国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 [5]袁康.越绝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6]魏启鹏.《黄帝四经》思想探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On Fan Li's Contributions to Ideological System of Taoism

Xu Wenw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Abstract:** In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nker Fan Li'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system of Taoism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formation of Taoism's "reasoning world rules to understand affair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affairs and world make reference to each other", the practice principle of "take inheritance as the main principle" is also developed by Fan Li's methodology of "according to origin", Fan Li's "world cycle" thought and Yin-Ya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are cor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system of Taoism.

**Key words:** Fan Li; Taoism; influence